

张广达文集

史家 史学与现代学术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广达文集

张广达 著

史家

史学与
现代学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张广达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5633 - 7520 - 2

I. 史… II. 张 III. 史学 - 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69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965mm × 670mm 1/16

印张:21.5 字数:291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5 000 定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我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种。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的学习经历和文集内容略作说明。

我 195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但在 1957 年教员资格被取消。1970 年代末恢复教职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种种际遇使我较早接触了中亚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两个领域,从 1950 到 1970 年代,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和父亲张锡彤先生利用运动的间隙,一起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 V. Barthold, 1869—1930 年)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似乎没有旷日持久地荒废光阴,稍获念书人的心灵安慰。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译巴托尔德书的过程中,我时时被巴托尔德治学的专注和敬业的虔诚所震撼。同时,由于翻译巴托尔德,我进而知道西方有专注于阿拉伯文献的卡·布洛克曼(C. Brockelmann)、德·古耶(M. J. de Goeje),专注于波斯文献的约·马迦特(J. Marquart [Markwart])、布劳恩(E. J. Browne),专注于中亚出土文书的缪勒(F. W. K. Müller)等大家。由此,我开始注意这些西方学者研究文史的规模、气象及其与我国学者徐松(1781—1848 年)、王树枏(1851—1936 年)、陶保廉(1862—1938 年)、王国维(1877—1927 年)等治学路径的同异,并从他们身上寻求我的精神寄托。1978 年重上讲台后,我不顾自己的学殖荒芜,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此次出版的

三种文集是我 1978 年以来的一些文字的结集。

我衷心感谢一些学侶，此次大力帮助我将历年刊出的不曾分类的文章厘定为三辑，使得每辑文章各有侧重，取向略有不同：

第一辑为《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样，具莫大魅力。每当学人解破一件西域出土的关键性文书，就会感到兴奋莫名。与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绿洲和沙碛似乎总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续不断地提供更多有待人们揭破的奥秘，举世对内陆亚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证。就文化内涵的多样而言，特别是就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方面的丰富性而言，西域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或者说整体史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年）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进行一番架构，进而展开综合性研究。收入本辑中的文字虽然全都局限于西域的一时、一地、一事，但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无时或忘各种史籍中有关多元文化在西域的汇聚与融合的记载以及相关的出土文书文物。笔者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与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收入本辑中的一些文章发表较早，此次结集，各位学侶帮助我改正了错字、标点，润色了文字。遗憾的是，在一些文章后面所加的“附记”中，笔者没有可能做较大的补充，以反映后来陆续解读的西域古文献、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后来的学术进展面貌。

第二辑为《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自 1900—1901 年起，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边缘上的绿洲废墟，次第发现了汉晋时代以来的简牍、胡语文书和带有图像的文物。简牍、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发现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发现将会为学术研究带来怎样的转折。为时不久，人们在考释简牍内容和检阅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简牍的词句虽然简略，但是经过和文献记载互勘、互证、互

补,可以阐发简牍和文献记载的丰富内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细节。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出土史料,简牍显然比书本记载更多反映历史情状,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节端赖出土简牍而再呈现。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从此,人们研究汉晋以来历史,只要有简牍、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资参证,人们便会逸出文本记载的范围,不再让自己局限于传世文献。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语言的转折”(linguistic turn)一语,我们无妨说,在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文献的转折”(documentary turn)。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

笔者侧重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的交流。笔者每当在美国看到长途汽车公司之一以灰狗(greyhound)为商标,在法国看到邮局用 cheetah 豹的生动图像为特快邮递件(chronopost)做广告,我的思路就不禁回到唐代贵族陵墓壁画上的文豹或猎豹的图像上来,也不禁想到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86—1952 年)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许多唐代出土文本和图像史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第三辑为《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此辑收录了出于不同起因和不同情况而写的一些文章,因为多少都与学术史有关而汇辑在这里。百年来,中、日、英、法、德、俄、美、荷、意、匈等国的汉学和东方学的发展情况是我感兴趣并至为关心的课题。我看到,不同国家的学术生态和具体语境不

同,导致各国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然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为了使论述不流于空泛,我选择几位在汉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作为研究个案,分析他们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考察他们在学术转型中的不同作用。王国维、内藤湖南(1866—1934年)、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及其门生、巴托尔德、恒宁(W.B.Henning, 1906—1967年)等人一直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对象,在本辑中,恒宁等还没有涉及,其他几位宗师的业绩虽然被选作研究课题,但是既没有写完,更没有写好。留意他国的汉学和东方学使我深受教益,本辑中,我对中古史研究的许多观点和思考,就来自比较不同国家的治学路径所受到的启发。此外,卜德(Derk Bodde, 1909—2004年)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年)关于中国有没有现代科学的激辩,也是我始终关注的课题,我一直盼望我能够就这一课题做些工作。

出国二十年,我有两点体会日益深刻。(一)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反思,特别是注重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reflexivity)。我感到,历史学不仅要注重对个别的史料、史实、史事批判性分析,而且也需要对整体的史学思想传承和史学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反思。(二)如果我们想要或多或少赋予自己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学意义,那么,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取得历史知识学(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层次的一些认识——哪怕是一些肤浅的认识——便至关重要。现代化阶段的史学研究,显然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有限的、封闭的思考架构中就事论事,因而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深入细致地比较一些相近的个案,以小见大,得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四处游学,有失有得。因为中外同行的热忱支持,间有基金会的资助,我参加了一些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作为参与者(actor),我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之外的学术环境,体验多种不同的学术氛围。参照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年)论证的“他者”(the other)说,我时时检视并修正过去身在
国内形成的单向思路。另一方面,实地考察欧美及日本在社会与人文学
科领域的重要成果,有助于我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中国历史的一些问
题在距离拉开之后凸现出来,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只要精力允许,我
将继续这些工作,整理分析已经搜集的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和中、日、法、
俄等国汉学家的资料,完成我手头的几件“半成品”,庶不辜负师友多年
来对我的深切关怀爱护。

最后,在三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荣新江、朱玉麒、许全胜、孟彦弘、姚
崇新、雷闻、陈怀宇、陈明、党宝海、余欣、杨晓燕、朱丽双、李丹婕等人承担
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此我深表谢意。令我特别感激的
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此而费心尽力,作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统筹者刘
瑞琳女士,做了种种安排,甚至派遣编辑来巴黎协助我的工作,在此我深
致谢意。

张广达

2008年5月24日于巴黎

目 录

总 序 / 1

学 术 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 1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 42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 57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 134

学 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

《突厥斯坦》一书 / 176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 196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 206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 214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 221

书 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 229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 250

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 254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序 / 259

书 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 263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 267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 277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

——近代之前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 285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 293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 298

评 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 年蒙哥大汗

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 302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 4 卷 / 306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 312

自 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 319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一 时 代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在世五十年间,正值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阽危的时代。两千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内部变乱和屡遭周边势力侵袭的经历,而且内外因素的互动每每导致中央王朝的瓦解。唯独此次际遇大不同于既往:门户洞开、列强环伺,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剧烈震荡,而且历来自我标榜为天下中心的天朝帝国的崩溃预示着中国自身即将被卷入世界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人们遇到了随社会转型而伴生的新旧观念替置的考验。

在19世纪中叶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¹的观念的支配之下,中国曾经主动引进应用型的西方技艺。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引进不会妨害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仍然保持其普世意义(universalism),更意识不到中国文化相形之下或有沦为一偏文化(particularism)之虞,因而不存在太大的思想障碍。经过同治、光绪两朝的洋务运动,西方知识体系,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及其价值判断系统,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也就势传入中国。西方人文学科及其思想体系的大举传入,势必带给儒家思想及其维护的专制体制以冲击。对于经朝廷和封疆大吏极力提倡,戴震(1723—1777年)、段玉裁(1735—1815年)、钱大昕(1728—1804年)、王念

¹ 《礼记注疏》卷三八,《乐记》二,《乐者非谓黄钟》条。

孙(1744—1832年)、王引之(1766—1834年)、汪中(1745—1794年)等大儒所确立的清代学术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从尊奉而开始产生疑问。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和儒生之中没有人全面否定旧学,但是,西学的冲击和风气的转移促使有识之士疏离汉学、宋学之诤,不再唯文字训诂和史实考据是务。时势的变化导致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危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以龚自珍(定盦,1792—1841年)、魏源(默深,1794—1857年)为先导,不少士子逐渐摆脱中国乾嘉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的治学路数,另从中国的通经济世、微言大义的传统中发掘张大改制的理据。对于这一变化,王国维有直接的论述,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初乾嘉二派“为学之成法”已经不能“适中当世之弊”²,注意到龚、魏“忧世之深”³,指出龚、魏之学在道光、咸丰之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⁴。根据王国维的证言,可见经世致用观念的复活和公羊派的兴起既继承了中国固有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反映了时代的变异和当代士人对时局的忧虑。读书人尽管感情上留恋旧学,但是不乏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古今局势的不同,时代已经不是孟子所说的只能“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的时代了⁵。面临难于逆转的世界大势,中国势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从变动制度上开拓局面,而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筹办洋务,寻求富国强兵的一时权宜之计。有此认识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是郭嵩焘(筠仙,1818—1891年)。由于果敢之士的提倡和内外危机的深化,变法维新的思想骤然成为人们的共识,虽然朝野上下对此认同的程度远远赶不上日本。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90年代,世变日亟,大道多歧,在江山代出的才人之中,已经是康有为(长素,

2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三,《王国维遗书》本,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叶二六。以下所引王国维的著作均据这一版本。

3 同上,叶二七上。

4 同上,叶二六下。

5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上。《孟子·滕文公》上原文作“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1858—1927年)、严复(几道,1854—1921年)、章炳麟(太炎,1868—1940年)、杨文会(仁山,1837—1911年)、梁启超(卓如,1873—1929年)、谭嗣同(复生,1865—1898年)等人物崭露头角,崛起于学界、政界,显示精英主动性了。无待赘言,他们对于现实及其演变趋势各有各的解读,并据以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重估传统学术的价值,进而规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领域。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安],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出生在这样的新旧转折时期。他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在浙东人文荟萃的故乡海宁,接受旧式儒生的传统教育。但是,风气所渐,他已经不再以仅仅讲求旧学为满足。他在1898年初来到上海,时年22岁,体弱多病,在劳累的工作之余学习日语、英语。1901年末至1902年夏一度东渡日本留学,因病归国后肆力于自学西方哲学,并从日文翻译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心理、美学、逻辑、法学著作。1903年起,任教于师范学堂,同时继续研究德国哲学,探讨人生意义,并以“填词自遣”,抒发“欢也零星,悲也零星”的苍凉寂寞、抑郁寡欢心情。1907—1911年(31岁至35岁)到北京学部供职,治学兴趣转向中国文学,侧重文艺批评,研究戏曲。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以辛亥革命为转折,王国维的治学道路断然分成两截:1912年36岁以前不分中西,兼治新学旧学,1912年以后舍弃西学,专注于中国文化遗产的实证研究。

王国维投身国学研究实际上只有十五年的时间(1912—1927年)。在这短短的十五年内,他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观其会通”,“窥其奥窔”,由于根柢深固,枝叶遂繁,得以在经学、古文字学、训诂、声韵、名物、甲骨学和商代史、周代青铜器物与金文、周代制度、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演变、汉魏学术、魏蜀石经、汉晋简牍、唐人写卷、古代地理、宋代以来金石学、边疆近代新出碑铭、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史、西北史地等诸多领域迭有独到的创获。在西学强势传入,地上地下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的建树维护了先哲之业于不坠,为后进奠定了纵深拓殖的基础。他的学术水准为他确立了国学祭酒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学界无分新派旧派的一致悦服和当代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崇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辞世,海内外人士同声哀悼。中国和东邻日本学者们的追忆文章已为人们所熟悉⁶。这里略举西方学者的评价和反应。例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在《通报》杂志讨论栏中写道:“作为王国维老友的我,作为经常引证王国维、多方受益于他的渊博而门类多样的学问的我,谨置身于各界人士的行列之中,向这位同道敬致哀悼。看到他的工作中辍,至为痛心,不胜惋惜。罗振玉氏早年资助年轻的王国维的时候就已有预见,近代中国还没有产生过探索如此精深、涉猎如此广泛的渊博学者。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殷墟甲骨文字将难于释读。不参照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订正和增补,就不该阅读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对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年)发现的流沙坠简的考释。王国维还为科学地研究中国的戏曲和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于学无所不窥,而无论治哪一门学问,他都开辟了新的门径。”⁷

今天,王国维的著作流传于世,经常被后学引证。国学值得保存的部分,由于他具有实力的创新而得以保存。在行将到来的文化多元世纪,王国维的业绩为开拓中国学术的未来做出了贡献,从而再次证实改变能力与保守能力的相互为用⁸。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王国维流于伤感的悲观性格和传统道德对他的制约作用。在王国维身上,明显地流露出来中国士大夫的淑世匡俗的心态,或借用今天西方流行的语词,呈现出来传统社会“规范化行为”(Habitus)现象⁹。成长和生活在中国语境中的王国维,虽

6 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7 《通报》(*T'oung Pao*)第26卷,1928年,第72页。

8 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法国革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企鹅丛书本,第106页。

9 源于拉丁语,原意为“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德语中 der Habitus 本指体型、外貌。法语 le habitus 亦同。小 Robert 法语词典给出 le habitus 的社会学意义是: Manière d'être d'un individu, liée à un groupe social, se manifestant notamment dans l'apparence physique (vêtements, maintien, voix, etc.). 此处借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年)开始研究、诺尔伯特·伊里阿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年)深入探讨、皮埃尔·布厄迪(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年)予以推广的这一术语的社会学引申意义:“规范化或构造性的习惯行为。”马塞尔·莫斯是爱米尔·涂尔干

然研究过西学,但是舶来的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究竟日浅,不足以促使他明确做出如下区别:何者是个人修身层次上的道德规范,何者是仁者为怀层次上的人间关切,何者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符号系统。简言之,受传统文化全面浸润熏陶的王国维,思想感情犹如一张磁碟,被传统所格式化(formatted)了。1784年,即大清帝国高宗乾隆四十九年,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发表了《答〈何谓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该文的第一段即开宗明义,为启蒙下了明确的定义:“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 self-incurred immaturity)中解脱出来。”¹⁰康德号召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敢于求知!(Sapere aude! /Dare to know!)”¹¹不幸,王国维在长年累月探讨中国传统学术的过程中,恰恰在践履伦常道德(如“在三之谊”)¹²和奉行专制制度下的符号系统(如“君辱臣死”)方面没有摆脱自我招致的依存状态,对传统社会的“惯性行为”没有经过理性的系统检验而有所甄别,即一揽子将其定格于自己的思想感情之中。

综观王国维一生五十年的经历,可以化约为一位耿介恬退的学者在祸乱频仍、社会转型、观念替置岁月中所做的一系列选择和取舍的过程。

(续上页)(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的外甥和门生,协助涂尔干创办和编辑《社会学年刊》(Année sociologique),继涂尔干之后为法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物,年鉴学派健将之一。他的《礼物》一文最初刊载于《社会学年刊》新辑第1号,1923—1924年,第30—186页(汲喆译、陈瑞桦校,《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莫斯从小小的“礼物”着手研究原始社会交换形式和功能,全方位地揭示它所包含的宗教、法律、道德、经济以及审美层面的社会学意义。

10 Immanuel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1970, 1991, p.54; 转引自 M. Burns and H.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第52页。参看刘皓明《启蒙的两难·康德篇》,《读书》1995年第3期,北京:三联书店,第86页。

11 康德关于启蒙的这一格言的译法,此处依据 Appleby and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第40页。

12 参看王国维对戴震与老师江永的关系的指责,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卷一二,叶三三下。

选择(choice)和取舍(preference)两个概念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前者往往可以借助于工具理性而做出抉择或简选的权衡;而后者则因为涉及价值取向,在不可得兼的两难情况下不得不有所割舍。王国维到了晚年,对中外时局、对中国趋于极权主义的走向不乏远远早于哈耶克(Friederich/Frederic Hayek, 1899—1990年)的先见。他几次引用《诗经·小雅·雨无正》的“若此无罪,沦胥以铺”¹³,为生民之“沦胥以铺”而悲伤。依据朱熹《诗集传》卷五《雨无正》的注解,沦,陷也;胥,相也;铺,遍也。此言彼有罪而死则是伏其辜矣,若此无罪之民,而使之相与陷溺死亡无不遍焉,则如之何哉!“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是王国维晚年概括诡谲纷浊的现实世界的极为重要的观点,表明他的主体性取舍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取向。但是,无可讳言,面对充满强权和悖谬的混沌时局,他的怀旧情绪和“惯性行为”加剧了他的精神的迷失。他面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背反而“内自讼”,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置自己认同的价值追求于生命之上,以弃绝人寰来对抗道德的沦丧。一位卓有贡献的学者以这样“行己有耻”的人生取向体现道德精神,既发人悲痛,也留下了一个启人反思的严峻课题——如果我们认为王国维最后与人世的悲剧性“断裂”分明具有时代悖谬的性质,那么,又当本着怎样的价值系统避免精神迷失,在“沦胥以铺”的时代立身,在原来的道德“惯性行为”(Habitus)之中作道德取舍?

13 王国维在1919年3月14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世无神禹,岂能抑洪水之祸耶?智虑短浅,人才乏绝,恐各国皆然。《诗》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沦胥’之语,似为我辈而设。”(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5页)。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把世界局势的混乱归结于西方数百年来讲求富强的结果:“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20年王国维致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信中又说:“世界新潮湮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1页)。这一见识和1919年后梁启超访问欧洲在《欧游心影录》中的观感如出一辙。王国维有“沦胥以铺”的想法,看来久蓄于心,“不能不为我国人与我世界之人类垂涕而道”。参见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手书的一篇无题文稿,录文见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3—224页。

二 王国维一生的选择和取舍

(一)疏离“官学”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王国维的家境说不上贫寒,但也很不富裕,一岁所入,仅足衣食。他在故乡海宁接受的是传统的旧式学塾的教育,年纪轻轻,便不喜十三经注疏而嗜读前四史,显示出非凡才智。1893年夏历七月,王国维年仅17岁,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不待终场而退出秋闱。在当时,实行了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是士子致身通显的正途。退场之举表明,年轻的王国维不沾沾于章句之学,不屑于八股时文,其勇敢的选择已分明有别于占毕陋儒。在士大夫与专制皇权共生共存的时代,读书人的分化后果是明显的,放弃士子的主流追求,不仅丧失现实的功名利禄的前程,而且一旦被挤到士流的从属层(subaltern)¹⁴,就有可能终生在困境中挣扎,例如,清代著名学者汪中,虽然才高轶众,却过着“簪笔佣书、倡优同畜”,“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的贫贱生活。我们看到,此后王国维虽然又参加过乡试,但是没有全力以赴。不喜科举而又参加,参加又不尽力,正是这一看来矛盾的举止反映了年轻的王国维的选择倾向。他在“官学”和学问之间做出第一次人生取舍,放弃了功名利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据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的日记,1894初,王国维不满十八周岁,曾经撰文“条驳”俞樾(荫甫,曲园,1821—1907年)的《群经平议》¹⁵。在当时,如果他退出科场、放弃功名之举或许由于风气之所渐还算不上罕见的特立独行,那么,早年敢于质疑经学大师俞樾,则显示了这位未来拓殖国学的学者已具卓

14 此处借用 subaltern 一词,虽受 *Subaltern Studies: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1999) 内某些论文启示,但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无关。

15 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4页,见该页转引王乃誉甲午年五月初一日日记。